

清代杭州金氏家族文化传承的特质及其意义

◎龚慧兰 毛筱英[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衢州 324000]

摘要 清代杭州文化家族兴盛,金氏作为典型的江南文化家族,其家族文化特质主要表现为:以儒为业,科举仕进;孝悌承家,以德立身,重视教育,诗书传家,经史根柢,以学资诗。以金氏家族为中心,可以看清清代家族文化与一代文学之关系。

关键词 杭州金氏家族 家族文化特质 意义

家族承担着多种社会功能,家族“具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关系网络及行为规范,表现出一定的文化特征和功能。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家族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系统”。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家族文化既有对前代的继承,又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家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杭州地区文化家族丛生。杭州金氏便是其中一典型的科举型文学家族,历经百余年,以金德麟、金虞、金牲为中心的家族成员在诗文创作、经史考据等方面多有涉猎并成就卓著,可谓一门风雅。不仅如此,他们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并以此为人生志向,在清代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军事、文化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金氏家族的核心人物是清代乾隆状元金牲,金明迈是其曾祖父,金星瑞是其祖父,金德麟是其父亲,金虞是其兄长,金三吾、金三俊是其儿子,另外清代状元汪如洋是其外孙。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五代人组成的科举家族。据朱珪《礼部侍郎金公牲墓志铭》记载,金牲祖上由会稽迁杭,曾祖金明迈曾担任明朝的江南兴化四世主簿,祖父金星瑞曾担任云南师宗州知州。至父亲金德麟时家业已经衰败,“先祖歿时生计已薄,先资政鬻产营葬,因花市典屋勒负构诉,家业遂尽”。关于金德麟,陶元藻在《全浙诗话》中记载其为“钱塘布衣”。清代乾隆七年(1742)金氏家族中第四代成员金牲苦学成才,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一名,赐进士及第,不惑之年高中状元,后官至礼部侍郎。金牲外孙汪如洋,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会试、殿试中,又连夺两个第一,戴上“会元”“状元”桂冠,令人羡慕不已。中国科举史上,外祖父与亲外孙在同一朝代连中“二元”的绝无仅有,一时成为科场佳话。

一般而言,若无显赫的政治地位、雄厚的家产,一个家族要想长久地生存和维系巨大的声望,是极其艰难的。但金氏家族在政治地位衰落、家业不振的现实困境面前,不仅没有湮没于众多大家族之中,反而在清代中期崛起,可谓意义特殊。因此,从家族族谱、家训、诗集、名人史料中对金牲家族文化特点进行审视,可以更进一步了解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质。

一、以儒为业,清白承家

“家风是一个家族的世德、门风,是家族的精神文化传统。这是文学家成长的精神环境,也是无形无质却影响深刻的精神财富。”金氏先人由会稽迁往杭州之后,就一直延续“清白”家风,数世积累,第四代成员金牲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清白”之门风。翻检金牲《静廉斋诗集》,多次在诗集中提及“清白承家”。“清白承家是子孙,云雨翻覆更无论。囊空赢得诗文富,小树新亭世业存”(《行次定远侄三品遣力奉大兄遗集至泣题十二绝》)、“承家唯孝悌,报国重循良”(《英德道中示男三吾侄三典》)、“清白翼传家,粤装剩空袱”(《喜晤缙华给谏即送还朝》)。金氏一族自曾祖金明迈后,多入朝为官,祖上虽未能位列三公,但几代成员多人参加过科举,家族成员文臣武将都有。据朱珪《礼部侍郎金公牲墓志铭》记载,金牲之祖父金星瑞曾担任云南师宗州知州,兄长金虞曾担任湖北孝感令,金牲乾隆七年(1742)中状元之后,授职修撰,后官至礼部侍郎。金牲二子金三吾、金三俊亦参加科举考试,金三吾乃乾隆四十二年(1777)丁酉科举人,广东四会县知县,候选郎中,金三俊为太学生,议叙盐大使。金牲外孙汪如洋乃乾隆四十五年状元,任云南学政。金氏一门虽几代人入朝为官,可贵的是家族几代人都能置身朝堂不染纤尘,而在金牲诗文中出现的“清白”二字,足以说明金氏家族虽崇儒右文,重视科举,但并不一味追逐功利,而是以清白为为官之准则,并逐渐形成一种家风。金牲在《行次定远侄三品遣力奉大兄遗集至泣题十二绝》中记载“先祖令乐亭牧师宗并入名宦,兄在孝感亦著循声”,可见金氏一族在外为官都有循良之声。与金牲同时期的钱塘名宿汪惟宪,字积山,号水莲,为人

“性高疏,有洁癖,不慕世荣”。他在《金长孺六旬寿序》一文中记载:“吾友长孺金先生文采卓卓,秀出班行,而不得成进士登王堂。著作之选编种种矣。屈而为吏,清白在已。”在这段文字中,汪惟宪一面叙述了金姓兄长金虞的文采卓卓,一面也从侧面评议了金虞之品格,其人才华横溢,但奈何科举之路坎坷,不得已屈身为吏,但却始终心怀清白。而作为家族中的核心人物,金虞一方面承担了周济家族的重任,另一方面这种“心怀清白”的坦荡胸襟也对其他家族成员影响深远,金姓在《得蒲县志大兄列循绩中感咏一首》中歌咏其兄之业绩:

浦城久抱鹄原痛,新志惊看姓氏存。胜有循声传晋楚,更无长物遗儿孙。萍踪飘转常相逐,雁唳凄凉不忍言。一卷史书良足矣,挈归酌酒报椿萱。^①

金姓中状元后,曾入值上书房多年,《清史稿》记载“姓在上书房十七年,直谅诚敬,所陈说必正义法言,诸皇子皇孙皆爱重之”^②。为人耿直诚敬,生活俭朴,不慕虚荣。不仅如此,他在家庭中教育子孙也重视名节,在写给儿子金三吾的诗歌中多次告诫次子为官要重视名节,保持“清白”之名。“名节且留清白在,湖山共适性情多”(《望三吾》)^③;“瘴海回帆保清白,粤装虽乏足承欢”(《喜三吾至》)^④;“吞腥啄腐饥驱累,清白终须戒染丝”(《三吾薄游江左老怀惘惘杂咏四律示之》)^⑤。金氏家族成员在官任上大都能精忠爱国、勤政爱民。通过家书、诗歌等形式,金姓将祖上为官重“清白”之家风传递至数代家族成员,家族成员在良好家风的引导下,多人任职朝堂,在外为官清正廉洁,进一步巩固了家族的威望。

金氏家族的清白家风彰显了其家族的高雅品格,不仅有利于告诫、敦促家族子弟为官廉洁勤政,而且清白之家风更是融入风雅传承之中,塑造了金氏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道德品格。

二、孝悌承家,以德立身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中国儒家文化历来重视孝悌,如孔子非常重视孝悌,他认为孝悌是做人之本,在论述“仁”时曾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⑥孝悌之道是一种基础性的道德养成,是实现仁的现实基础。在这段话中,孔子认为孝悌是儒家仁爱之根本,平时在家能孝敬父母、友爱兄长,在外处事就很少会悖逆尊长。久而久之,美好的德行就养成了。《孟子·告子下》一文中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⑦《孝经》中也引用孔子所说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⑧。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孝悌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倡导孝悌之义,践行孝悌之道,有助于规范家族群体生活规范,有助于增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有助于优化社会的惯常秩序。所以当代学者谢幼伟在《孝与中国社会》中说:“中国社会是彻始彻终,为孝这一概念所支配的社会。”^⑨

清代杭州金氏家族之所以能够在家道衰落之时崛起,与其家族重视道德品质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尤其是金氏家族的核心人物——金姓,他尤其重视家族子弟的品德教育。这一点在金姓所著的《家诫五十首》组诗中可见,在组诗的小序中金姓写道:“凡切于日用、终身可行之理,演为《家诫》五十章。以垂示子孙。顾知之而未能行之,即吾亦长在戒中也。”^⑩在这段序言中,金姓将日常的行为规范编写成五十首家诫诗,在这五十首诗中,金姓叮嘱他的儿子、侄子等金氏家族成员如何做人,如何树立正确的行为准则,可以说这五十首家诫诗歌是金姓家庭教育思想的集中阐述,内容涉及尊卑礼仪、道德养成、文章教化等多方面内容。例如第一首诗云:“立身唯树德,大本在伦常。忠孝揭日月,岂待言说详。”^⑪家诫、家规是金氏家族维系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五十首家诫诗,实际上是金氏家族教育的教材,金姓确定以德立身、德行教育、守礼孝悌是金氏家族品德教育的核心内容,要求子孙要遵守儒家传统的礼法,尤其强调长辈对晚辈的身教重于言教。据袁枚《礼部侍郎海住金公传》记载:“姓有至性,母患腹疾,公以口熨脐而嘘呵之,疾遂平。”^⑫此事是金姓侍母至孝的一个生动例子,这种孝顺父母的行为是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为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质养成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言传身教”的范例。

“人之孝行,贵于诚笃。”中国古代家风历来注重人伦的培养与教化,重视父子关系、兄弟关系,认为孝悌是人伦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金氏一族受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影响,注重孝悌,并将这种孝悌落实到具体的家庭生活之中,在许多慕祖诗、勉子诗中都提及孝悌乃承家之本。

三、重视教育,诗书传家

在科举时代,金氏一族之崛起,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金氏族人先后入朝为官,且外祖父、外孙连中状元,是一典型的以文学起家之族,且金氏家族三代均有能文之名的成员。以儒为业、科举入仕之家风对家族文学创作主体之培育也有着特殊意义。以金姓为例,他在不惑之年高中状元,一时被传为佳话。在科举上的成功,并不是偶然,是其所在的金氏家族几代人共同培育

的结果。

据金牲《静廉斋诗集》记载,先祖父在诸孙中尤喜爱金牲,“资生尚有田园在,督课常教灯火亲。象勺舞来真最乐,颇闻诗学及滋长”^②。“督课”是清代文化家族内部教育的一种日常方式,最直接的目的是对科举功名的期待,督促家族子弟读书学习,这种教育虽略带功利性,但先辈对家族后辈成员的文化滋养往来源于此日常的教导。据有关文献显示,金氏一族最早有诗文流传于世的,当属金牲父金德麟。金德麟虽为钱塘布衣,但为人开朗豁达,热衷文艺,其风范对后代影响较大。如陶元藻《全浙诗话》记载金德麟:“暇则读书赋诗为乐,数十年来积成卷帙,不轻示人,余曾爱而读之,其腴美如饫梁肉,其清芬如茹苦茶饮茗汁,神气高邈,游览不尽如入千岩万壑,不可指某水某邱为佳胜地。”^③由以上可知,金氏家族第三代成员金德麟在诗歌方面造诣极高。对文化家族而言,家族内部前辈的文学创作,遗存之诗歌文本,往往对家族子弟的文学创作有引领与昭示作用。“牲时甫四龄,先资政好咏诗,自幼教识平仄,十余岁时亦解觅句”(《七十初度述怀二十首·其三》)^④,父亲自小教授诗歌音律平仄,金牲十余岁便能进行诗歌创作。祖父、父亲可堪称是金牲文学创作的启蒙人物。

汪惟宪在《金氏二友》一文中提及金牲、金虞兄弟父母“尊人新亭先生博雅君子,工诗。余尝求其全集,读之浩乎渊乎如春江之涛,汪洋瀟漫而不可涯涘也。母夫人余杭严氏贤明淑慎,于书能尽览无遗。新亭先生随父宦游滇南十年不得归,比归长孺已成通人矣。盖禀母夫人之教居多”^⑤。清代的文化家族,父亲往往为求功名、赴科举、兴家业,要外出游幕、做官。抚育子女、教导后代的责任基本上要由母亲承担。金牲之父金德麟随父游宦滇南十年,母亲就承担了家庭教育的重担。罗时进在《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中认为:“由于清代江南文化家族众多,风气相对开放,女性在这样的家族中从事文学阅读和文化研习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她们及笄待字时,往往已经通经擅文。”^⑥在父教缺失、子女年幼的情况下,江南文化家族中的母亲往往承担起家庭教育的重担,这对家族中文化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延续了家族的文化精神命脉。

金氏家族三代皆有能文之士,多人中举,除了与父母之教有关外,还与家族成员之间互助友爱、和谐团结密不可分,同时,也表明清代的江南文化家族内部,在重视父母关系的同时,也重视兄弟关系。金虞、金牲之父金德麟曾随父宦游云南,金虞作为长子,自然在家中

承担起父亲的教育责任,他带领弟弟金牲读书范氏从碧楼。“丁酉以前家日落而业亦荒,戊戌从先兄读书范氏从碧楼,始识作文蹊径。”(《七十初度述怀二十首·其四》)^⑦金虞是当世时文大家,却多年科举不中,公车蹭蹬。后迫于生计,金虞外出游宦。此事可见汪惟宪在《金氏二友》一文,“会试再不第,家益困,计无所施,欲从事于外为糊口,谋适粤西学使者。平湖陆公闻其名,聘之阅文丛。京师至粤西三年,又自粤西从其师临川公开府保定参幕,事席未温旋至江右一年,为当事所推荐至京师引见试用荆襄三楚间,所至皆称职,大吏以闻。雍正壬子始得实授孝感令”^⑧。这篇散文详细记载了金氏家族中的第四代成员金虞多次科考未能取得功名、辗转多地谋职以补贴家用之事,这种坎坷艰难的求仕之路让金氏家族的兄弟更发愤读书,尤其是对金虞弟金牲的影响甚大。多年苦学,终在四十不惑之年殿试一甲一等,高中状元。金牲在家苦读期间,同时又承担教养兄长子女的使命。金虞在《仍前韵寄弟雨叔》中写道:“此局只如都下第,余功亦足养中材。”^⑨(后自注:弟在家课余子)《国语·齐语》在阐释“父兄之教”时认为:“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⑩在科举时代,对许多来自下层的士人而言,家中祖父、父亲、母亲、兄长在学习业中往往充当教授者的角色,因而家庭教育的成功往往是他们跻身仕途的重要因素。

江南文化家族在科举家风的指引下,内部多行父兄之教,经济实力雄厚之家族则创立书院,供家族子弟学习,当时浙江地区书院、书楼数量较多,杭州地区书院比较有名的是崇文书院、敷文书院等,普通家庭则倾向于借读书院。金氏为了使家族的荣耀延续数代,书香得以继承,通过多种途径培育家族后代,金牲“子自戊戌从兄范氏从碧楼,兄举庚子子举癸卯”。金虞带领家族子弟读书范氏从碧楼之事更是直接印证,读书活动是江南文化家族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家族几代甚至十几代对此往往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四、经史根柢,以学资诗

清代江南文学家族普遍重视文化的传承与积累。家族成员几代人都致力于某一领域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富有特色的家学。

杭州金氏家族三代不仅有诗集问世,而且几代家族成员致力经史。如金牲,经史著述颇丰,以给经学、史学补遗辨遗见长。据袁枚所写传记《礼部侍郎海住金公传》中记载金牲著有《清语录》(十九卷)、《史汉评林订误》若干卷,今不得见。金牲史学造诣颇深,当时的钱塘

名士汪惟宪在《金氏二友》一文中说：“雨叔读书精敏，曾借余周礼抄本，附注数条，极有见解。”^①“雨叔”即金性，金性对史学的用功程度，在汪的诗集——《积山先生遗集》中同样有详细记录，诗集中所收录的《晨过雨书斋即事书其门人毕卫贤扇上》一诗具体生动地描绘了金性的治学态度：

清晨造高斋，先生卧未起。弟子盥漱毕，拂案整文史。随手攫一编，细字攒如蚁。墨乙而朱围，眼眩赫蹄纸。此特十之一，别本悉称是。上自骚赋颂，下至箴铭诔。汉魏逮六朝，搜剔无遗矣。中郎秘床头，安世识篋底。收拾一囊中，诂以彼易此。不唯手录勤，兼亦腹笥美。咀味出英华，吟讽含宫徵。数事若家珍，论古合妙理。下笔为文章，佳言真可市。想渠黑甜乡，江花生梦里。我尝畏先生，侪辈罕与拟。低头拜东野，自愧昌黎子。光阴赴壑蛇，学殖上滩水。四十五十时，无闻实可耻。如余嗜已而，诗以告志士。^②


金性治学态度严谨，对经史多年潜心钻研，积累了丰富的学问，在其诗歌作品中呈现出明显的以学问为诗的特征，或化用典故，或引用历史传说，丰富了诗歌创作的内容。陈维崧《听松庐诗话》记载金性时写道：“公少借兄虞，砥砺问学，尤淹贯史事。”^③以经史为本，在深谙经史典籍的基础上，金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以学资诗的特征，尤其表现在诗歌用典上。此诗同时也是清代文人博闻强记，肆力经史的鲜明写照。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④清代的文人学者，往往在学术上通明训诂、考证制度，范围涉及诸子百家，在阅读时，铢积寸累，勤做笔记，同时遇到有心得之处，常附录在旁，内容丰富，重考据，有些不乏独到见解。在漫长的考据生涯中，常一面怀着对学术的热忱，另一面忍受着物质生活的贫乏，正是在这如此清苦艰难的治学生涯中，一代学人完成了自身的学问积累，“数事若家珍，论古合妙理。下笔为文章，佳言真可市”。与此同时也表明，金氏族人已将读书、研究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金氏文化家族的独特存在方式。

不仅如此，金性的治学精神还影响了家族后辈。袁枚在《礼部侍郎海住金公传》中记载金性之子金三俊，“为枚校诗集，指示误用汉书、北史二事，想见公趋庭之教，所贻谋者远矣”^⑤。金氏族人强调以经史为本，家族后人刊刻多部经史作品。如金性之子金三俊著有《李氏蒙求补注》六卷，外孙姚祖恩著有《史记菁华录》。据《两浙輶轩录》卷十四记载：“姚祖恩字柳漪，号笏园。钱塘

人。乾隆甲辰进士。官广东博罗知县。”“扶荔山房”是钱塘姚氏书坊名，刊刻过的书有《静志居诗话》二十四卷、《史记菁华录》六卷、《南宋杂事诗》七卷、《野菰编》三十卷补遗四卷等。

杭州金氏家族的诗歌创作特征亦反映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清代浙江地域上的许多诗人都是史学大家，如杭世骏、厉鹗等人，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常将史学的内容、研究方法都渗入其中，也更增添了诗学的历史厚重感。“浙派诗学的史学色彩，显得更为浓重一些。”^⑥在清代诗歌发展的进程中，史学的参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说：“浙江与江南——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⑦康乾盛世，作为人文渊薮之杭州，学风昌盛，俊彦辈出。如厉鹗、杭世骏、丁敬等都是当时浙派名家，而梁诗正家族、陈兆仑家族、金性家族等是当时杭州名门望族，这些文化家族结社唱和、崇学向上、好古博雅，他们的价值取向、文化传承方式都对当时的杭州士人群乃至整个清代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儒为业、诗礼传家是清代杭州金氏家族文化最突出的特质，在这种家族文化的指引下，金氏后人为官廉洁、孝悌为本、勤于校勘、根柢经史、重学向学，对文学创作主体的培育及文学作品的结构、内容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浙江杭州地区文化家族的精神趋尚、审美意趣，杭州文化家族的诗性存在方式为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在江山易代后社会趋于平和状态下积蓄了文化力量。

综观金氏家族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代诗歌的变化取向，以此为中心，可以看清清代家族文化与一代文学之关系。

李卓：《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日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 [清]金性：《静廉斋诗集》，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0页，第458页，第584页，第585页，第604页，第589页，第589页，第540页，第540页，第540页。

[清]陶元藻编，俞志慧点校：《全浙诗话》（下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19页。

⑩ 罗时进：《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第46页。

[清]金性：《静廉斋诗集》，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页，第548页，第602页，第444页。

陈兆仑：《积山先生遗集原序》，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2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19页。

- ②⑨③③ [清]汪惟宪:《积山先生遗集》,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2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66页,第782页,第782页,第786页,第731页。
- ⑩ [清]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50,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22页。
- ⑪ 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 ⑫ 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页。
- ⑬ 卢付林注译:《忠经·孝经》,崇文书局2007年版,第52页。
- ⑭ 谢幼伟:《孝与中国社会》,见罗义俊编:《理性与生命——当代新儒学文萃》,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509页。
- ⑮⑯ [清]袁枚著,周本淳标注:《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5页,第1865页。
- ⑰ [清]陶元藻撰:《全浙诗话》,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7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46页。
- ⑱ [清]金虞:《小树轩诗集》,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 ⑲ 张永详译注:《国语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3页。
- ⑳ [清]张维屏编撰:《国朝诗人徵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7页。
- ㉑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74页。
- ㉒ 蒋寅:《黄宗羲与浙派诗学的史学倾向》,《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
- ㉓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见汪学群编:《清代学问的门径》,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7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Y201534665)、2016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项目编号:2016N20M)

作者 龚慧兰,文学硕士,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毛筱英,文学学士,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大学语文教学。

编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上接第19页) 瑞娜时说:“这让我明白了我曾经梦里的焦虑,在噩梦中,我梦见我的阿齐霉素用完了,然后我又去看牙医,可他没有奴弗卡因,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些人根本没有抗生素。”从救塞尔达的“安定”到梦中的“抗生素”,这个隐喻(科技和医疗等事业的进步)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便是现在,即便吉尔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现实生活中所缺乏的赞赏和鼓励,即使阿德瑞娜在19世纪90年代能够一展自己的设计才华,可见世才是最应面对的存在,打败旧时代的可以是科技和进步。

影片中,“掉书袋”的保罗提出了一个“黄金时代”理论,导演借他之口说明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这是一些人无法面对现实生活所产生的浪漫主义缺陷。的确,所以诸多的影评和分析便认为这部影片的主题便是“现世万岁”。我们所想到的“黄金时代”都只是我们想象之中的,而非现实之中的,说到巴黎的过去,便让人忍不住想起2006年汤姆·提克威的电影《香水》,影片描述的是18世纪的巴黎,一开始便展现了巴黎肮脏而恶臭的鱼市场,主人公便出生在臭鱼摊旁的烂鱼肠垃圾里,影片中现实巴黎之污秽,时至今日依然令人记忆犹新,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巴黎吧。伍迪·艾伦是名充满知识分子气息的导演,所以他笔下的巴黎告白书是唯美鲜活的,无论是“Si Tu Vois Ma Mere”这首书写慵懒、迷醉、欢快、潮湿、浪漫的法国香颂,还是在科尔·波特的钢琴下流泻而出复古的爵士乐,抑或者是丝丝入扣的风琴下的浪漫,他都表现了他心目中黄金时代的巴黎。虽然电影主题被定义为“现世万岁”,而且主人公也确实回到了现实,没再穿越回他的黄金时代,但

导演依然有“厚古薄今”之嫌,因为无论是影片《午夜巴黎》的名字,还是吉尔与加布里埃尔邂逅的午夜,都显示了伍迪·艾伦虽然更倾向于拥有“安定”和“抗生素”的现代社会的巴黎,但对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黄金时代”依然拥有致敬、厚爱之意,深藏怀旧之心。

五、结语

《午夜巴黎》展现了有趣的时空跨层,也描绘了多彩的巴黎,更抒发了伍迪·艾伦的文人情怀,让大众们体验到了一场视觉与灵魂的盛宴,让人不仅感叹于巴黎的美好,也惊叹于导演高人一筹的审美与文化修养,令人感叹。笔者虽然在此只是浅显地谈论了一下它的叙述艺术和主题凸显,但影片的叙述魅力远非如此,它的时空跨层和叙述技巧值得我们一再探究。■

参考文献:

- [1] 林大庆,林睿.不仅仅是好莱坞——细读伍迪·艾伦[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 [2]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 [3] 齐隆王.电影符号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
- [4] 霍金解读爱因斯坦的“虫洞”理论[OL].网易博客,http://blog.163.com/ttdhjhjx@126/blog/static/31202149201045113027696/.
- [5] 郭慧中.午夜·巴黎——电影《午夜巴黎》的关键词臆想[J].电影评介,2014(2).

作者 刘蒙,广西师范学院201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